

19806

潮州文史資料

第四卷
素琴堂

第七輯

(华侨资料专辑之一)



政协潮州市文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九月

资料室

潮州文史资料

第七輯

(华侨资料专辑之一)

(内部资料)

政协潮州市文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

印刷：潮州市第一印刷厂

核定工本费：每本1.65元

印数：2500册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88粤印准字第037号

前 言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对外通商，远肇唐宋；移民域外，代有其人；鸦片战争之后，更是高潮迭起，至十九世纪后期，潮州已成为广东省著名侨乡之一。

在历史上，潮州华侨较多地聚居在东南亚一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潮州华侨分布区域不断扩大，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迄今居留于几十个国家、地区之中。寓居海外的潮州华侨，秉承中华民族坚苦卓绝的精神，在求得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为居留地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远离祖国千山万水的潮州华侨，心怀祖国、情系故乡，历来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近代，潮州华侨支援祖国革命和襄助家乡兴办公益事业的功绩，永载史册；他们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有口皆碑。

新中国诞生后，潮州华侨爱国爱乡益增豪情。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十年浩劫”的灾难，侨务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华侨爱乡不得，报国无门；甚至，他们和眷属的合法、正当权益也遭到侵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潮州市各级政府和侨务部门，坚决拨乱反正，落实华侨政策，促使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从一九七八年以来，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已捐资人民币七千多万元，为家乡建设了一批学校、医院、敬老院、幼儿园、民房、侨联大厦（属农村乡镇一级的）、文化设施和水改、桥梁、道路等。当前，捐建项目正方兴未艾，而捐赠生产设备、投资办实业等发展侨乡经济的美举则有如雨后春笋。这些，都为“振兴潮州，建设名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潮州侨乡建设事业已出现崭新局面的今天，我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马芝济同志在郑仁章、余军同志近年着意搜集、整理的华侨资料的基础上，补充有关内容，编纂了这册《华侨资料专辑之一》。我们对马芝济、郑仁章、余军诸同志的辛勤耕耘，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期望，这册专辑不仅能够起着存史的作用，而且对于开阔人们视野，认识了解华侨对祖国的历史贡献，认识了解华侨造福桑梓的历史业绩，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推动侨务政策全面贯彻落实，为发挥侨乡优势，振兴潮州服务。

郑 名 榜

一九八八年九月

目 录

潮州华侨历史和状况.....	(1)
----------------	-------

- 一、潮州华侨早期移殖海外梗概
- 二、近、现代潮州移民高潮迭起和原因
- 三、潮州华侨的分布与动态转变

潮州华侨对侨居地贡献述略.....	(27)
-------------------	--------

潮州华侨对祖国桑梓的贡献.....	(38)
-------------------	--------

- 一、支持祖国民主革命的贡献
- 二、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业绩
- 三、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

华侨对近、现代潮州经济建设的投资.....	(60)
-----------------------	--------

- 一、工业的投资
- 二、商业性的投资
- 三、房地产的投资
- 四、交通事业的投资

潮州市先侨名人传记.....	(67)
----------------	--------

立功异邦的“武将军”

陈成宝留芳星洲

柔佛华侨侨长陈旭年

霹雳王顾问官许武安

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许雪秋

新加坡潮侨先贤陈永锡

银湖华侨富商吴庆腾

新加坡潮州乡贤陈德润

民主革命志士林受之

驰誉安南的华侨实业家郭瑛

新加坡华侨名流王邦杰

新加坡潮籍侨领廖正兴

传奇人物“二哥丰”——郑智勇

星马华侨实业家陈澈堂

旅暹潮州乡贤赖渠岱

麻坡著名侨领黄亚四

安南潮籍侨领陈澄初

新加坡文化斗士李润湖

香港潮州乡贤王少平

泰国著名侨领张兰臣

新加坡侨领杨缙文

新、马社团闻人林应标

华夏留芳迹、沙巴传美名的谢一坚先生

艺德永存的爱国画家陈天啸

泰国新闻界名人李其雄

白手起家的工商界巨子林子明

鳄鱼渡秋风亭（祭鳄台）简介……………黄泽雄(119)

封面插图：鳄鱼渡秋风亭（祭鳄台）……………田青 摄

潮州华侨历史和状况

潮州华侨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华侨历史的长河上，“潮州华侨”系指古时之“义安郡”、“潮州府”寓居于国外的侨胞而言，虽历经时代变迁、地域建置、名称更迭，然而相沿至今，原属“义安郡”、“潮州府”的华侨，包括已加入所在国国籍的潮人，尚惯用历史地域名称，海外以“潮州”、“义安”命名的华侨、华人社团，是历史上全潮属的地缘性社团组织。国内外今日通称之“潮州华侨”，从广义上说，它包括原潮汕地区和今丰顺县、大埔县的华侨；从狭义上说，只指祖籍潮州市（潮安县）的华侨。本文所述的潮州华侨历史和状况，仅限于狭义方面，但由于历史和地域更变的原因，在叙述过程免不了有所交叉，难以截然分清。

潮州华侨的历史悠久，他们是中华民族移殖海外的一部分；既有它的出现、发展的过程，也有其随着时代变迁的动态转变。潮州华侨的由来，初期主要是在通商贸易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继因皇朝更替，国内政局动乱，被迫避居海外的与时俱增；后来更多的则因政治昏暗，兵燹四起，水、旱、虫灾频仍，农村经济凋蔽，人民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不辞艰难险阻，陆续远渡重洋谋生，并就此定居国外。追溯潮州华侨出国之渊源，探究华侨创业之艰辛，肯定其爱国爱乡之历史，分析其动态转变之原因，对全面贯彻国家的华侨政策，激发广大海外赤子共同为振兴中华之热情，无疑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一、潮州华侨早期移殖海外梗概

潮州华侨初期主要是在通商贸易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和逐渐发展起来的。据《海外排华百年史》记载：“华人移民越南，有二千年的历史。”按时推之，当在西汉中后期便有华人移居越南。潮州“汉为揭阳县，复属南海郡。”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置县，因“南滨大海，故曰海阳”。南北朝时，潮州“离海十二里”。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取潮水反复之义，以潮为州名。唐代潮水可达城边，著名诗人贾岛《寄韩潮州愈》诗中有句：“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后李德裕贬潮（848年），《过恶溪》诗尚有“风雨瘴昏蛮海日，烟波魂断恶溪时”，可知当时潮州尚距海不远。潮州因濒临南海，距离东南亚各国比较近的地理条件和具有丰富精美的陶瓷、木雕、石刻、金银手饰、蕉布等工艺美术品和手工艺品，对外贸易事业很早就比较发达，与外国及周围地区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也比较早。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中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一万多士兵就是从潮州出发经澎湖到达琉球的。唐代的潮州已具有发达的造船业和比较先进的航海技术。据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卷八《井中船桅》记载：“有一叫丁巢云的人家在东堤。传东堤者，古城东堤岸也。今以城作岸，则东堤也城内地。丙午丁未间，潮大旱，井皆涸。丁巢云家命工人修井，多浚深数尺见白沙，又数尺见黑土，又数尺见土中横一大海船桅并绳索等物，削出灰黯，至泉立涌矣”。潮州古城于宋初已开始在四周修筑子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九月太守郑伸到任不上二月就全面维修内外城，花八个月完

工。“内外石甃七门：东广济、上水、竹木、下水；……”。东堤已在这些城门之内，说明丁家井下“大海船桅并绳索等物”当是唐代以前之物了。唐以后我国政治中心南移，加上航海业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已逐渐被海运所代替。潮州成为当时全国为数可称的几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经常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全唐文》有“波斯、古暹本国两舶顺风而至，诸蕃君长上叙海阳旧馆”之记录。唐末，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海运就更为发达。潮州的地理位置刚好处于唐代对外海上交通的中心广州和宋元时代世界贸易大港泉州之间；这种地当闽粤交通要冲的优越地位，使宋元两代的对外交往更趋频繁。当时人就指出：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外商不断到潮州进行商业活动，甚至放船载物而来。如《宋史·三佛齐传》记载：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佛齐国（今印尼）蕃商李甫海乘船舶载香料、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顺，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当年盛极一时的笔架山瓷窑，还生产有为数不少的外销瓷器。从印尼、马来半岛等地出土的中国瓷器表明，潮州是宋代陶瓷主要出口港之一。“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因此形象地称之为‘陶瓷之路’。又因路线主要在海，其兴盛又在丝绸之路衰落之后，有的学者也称‘海上丝绸之路’”（《中外史地手册·古代中外交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潮州人的足迹遍及北方口岸，远达南洋群岛诸国，以至印度、埃及、波斯、西班牙等地。这些以舟船为业的商民，很自然地有一些人在通商诸国的口岸定居下来，成为潮州人侨寓东南亚各国的先声。

《潮州志》载：“潮州对外交通，远肇唐宋。昔年帆船渡洋，一往复辄须经岁”。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潮州远

在唐代已对外往来通商；“一往复辄须经岁”，可见当时因为通商贸易的关系，已有潮州人暂居国外的现象。《南洋华侨史》提到：“华侨之大批移殖南洋，当在于唐代”。（但当代也有一些侨史学者对唐代是否已有潮州华侨移殖南洋，尚有不同见解，认为唐代的潮州还是人烟疏落的边远之区。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此州户万有余”。证明古之潮州尚不是人口稠密的区域，谈不上有什么海外移民。）韩愈虽有“此州户万有余”之说，但此时之潮州，已是“稻得再熟，蚕亦五收”、“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民物繁伙，风气顿殊”了。“退之刺潮仅七月而量移，一似匆匆过客”，在离潮时的《别赵子》诗一开头就写道：“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不谓小郭中，有子可与娱。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不但在韩愈莅潮前已有“两通《诗》与《书》”的赵德可为之师，而且“海中诸山中，幽子颇不无”。到了北宋初年，潮州已成为“鱼盐城郭民熙熙”的“而今风俗邹鲁为”了。南宋淳熙七年（1130年），杨万里从漳州知州调任广东提举路过潮州时，亲眼所睹沿途景物后，惊叹地写道：“旧日潮州底何处？如今风物冠南方！”物阜民康的潮州，当然是离不开对外通商贸易的发达的。

一般认为：早期海阳华侨移殖南洋，是先到安南，然后再到暹罗和马来亚各地的。今之印支三国古时通称“安南”。据《海外排华百年史》载：“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封天祚为‘安南国王’，此为安南称国的开始”。潮州民间早有“安南客，先过番”及“过番先去安南”之说；潮州城南郊韩江边相传有“安南庙”（今废），至今尚有“安南渡口”之称。从地理位置来说，越南是潮州与南洋群岛诸国航海贸易的第

一个口岸，加上安南昔为我国藩属，关系密切，历代皇朝更替，遗臣遗民逃往那里的人很多。《华侨历史学会通讯》载《堤岸的华侨社会团体》一文提到：一八二〇年柴棍（堤岸市前身）华商及华侨成立七府公所。七府即七帮，其中潮州帮（包括潮汕语系地区）名列第二位；各帮还各自设立本帮的会馆，潮州帮设立义安会馆。若从潮州帮参加柴棍七府公所及设立义安会馆的历史来看，说明“过番先去安南”的传说是有事实依据的。越南华侨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堤岸。潮州凤凰华侨在那里经营这二个行业生意的，世代相传，亦大有其人。

“中国之知有黄金半岛，远在唐以前。潮民循海道以至暹罗者，尚在唐未间。”这是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据《泰国潮州会馆特刊》载：“潮人之移殖泰国，约始于南宋末年。”南宋末年，元兵入寇，马发坚守潮州年余，潮州四郊均是瓷窑的乡村正当元兵围城屯兵之地。特别是元将唆都为报久攻不下之羞，城陷之日，竟下令屠城三天。前人有诗云：“不见唆都陷城日，滔滔标杵血流红，三家巷口留遗念，记取胡元一劫中”。元兵南下之时，潮州百姓为避兵燹，只有乘舟出海，流居东南亚各国之路；城陷之后也是南宋灭亡之时，义民遗官不满外族统治而相率避难海外，有的移殖于黄金半岛。这就是“约始于南宋末年”之记载。据泰国历史所记，泰族建立暹国素可泰王朝后，它的第三世国王坤南甘杏（中国史称为“敢木丁”）即与元朝通好，从此中国人进入和中国文物输入暹国渐多；应暹国的要求，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5年）曾派遣陶瓷工匠到暹国制作陶瓷器，设窑于宋甲洛地方。现在泰国尚留下不少遗物称为“宋甲洛陶瓷”。南宋

灭亡之时（1278年）正是元至元年间之中期；曾经显赫一时的“北宋瓷都”——潮州城四郊瓷窑经过兵燹洗劫全都荒芜，赖陶瓷为业的众多工匠，有的率先流亡海外到暹罗落脚，有的则作为“陶瓷工匠”被“派遣”前去。这些人侨寓暹罗，传播工艺技术，帮助制作陶瓷，可说是元朝期间移殖海外的潮籍华侨。

明代统治者虽然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潮民迁往东南亚一带的人却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多。举家出国，集体流亡者累见不鲜，而更多的是商人、小贩和贫苦农民；他们迫于生计，只得冒险外出谋生。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下令：人民“寸板不准下海，点货不准入番。”永乐后海禁曾一度放松。自永乐三年（1405年）始，明成祖使三保太监郑和、侯显、王景弘先后率船队七次下西洋，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联系。这些有强大国威作后盾的外交、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政治活动，其影响力对华侨的庇荫很大，“不啻为华侨南来之开路先锋”。其末次下西洋，在明宣德五年（1430年），当时的南澳便是“番倭互市之地”，饶平的柘林（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始割海阳之三饶地置饶平县，当时柘林尚属海阳县）也是“商船巨舰往来之所，日本、暹罗船只时有停泊。”据《马来西亚潮侨通鉴》载：“由于郑和等接续使南洋及印度等国，海行无阻，于是闽粤沿海人民，慕厚利，群趋为商贩，来往海外，华侨之南来日益众多矣。”从这一记载中也可以看到潮州华侨在明代因通商贸易而移殖东南亚的情况。明朝中期后，再次实行海禁。但由于朝政腐败，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严重，小民无以为生，只得冒险出洋谋生；同时，随着国内商品生产的发展，私商应运而生，不顾朝廷的禁令和高压手段，相率铤而走险，公

然进行对外贸易。当时流入海上的就被叫做“海寇”，列为清剿对象；官逼民反，拒民于国门之外。前往海外通商、谋生的沿海居民，有家归不得，流居于东南亚各地的也不乏海阳县人。嘉靖、万历年间，东南沿海还出现了几个潮籍强人：一是饶平人张璉，“为当时豪侠，雄踞粤、闽、贛三省，当轴（局）合三省兵力达二十余万，凡三年乃平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戚继光败于漳州、宁德等处，旋逃往旧港（即苏门答腊）。”万历五年（1577年）“商人诣旧港者，见张璉列肆为番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类似现代的海关负责人）。”二是澄海人林道乾，（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始以海阳县之僻望巡检司改置澄海县）他的“部属数千人之众”，“横行海上三十余年，达交趾、安南、暹罗。”后来率部到暹罗南部定居，一五七三年开始任掌管北大年港的客长。“他带去部属二千多人，是潮人大批旅泰的最早记录。”三是饶平人林凤，“在万历二年（1574年）十一月率战船六十二只，水陆军各二千人，妇女部队一千五百人，进军马尼拉，惩杀了西班牙殖民统帅高茅，菲律宾人民纷纷参加他的义军。”在历时四个月的起义斗争中，中菲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但明朝福建把总王望高却为虎作伥，居然帮助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攻打林凤！后“林凤的部队被迫退入深山，至今当地华侨还自称是林凤义军的后代，并引以为荣”。张璉、林道乾、林凤均属原在海阳地置县未久的饶平、澄海人（有的文章还统称为“潮州人”），他们的活动难免会对海阳居民产生影响，势必有人参加他们的行列，直至跟着他们移殖于国外。

清朝入关统治中国，潮州人民又一次遭受改朝换代的浩劫。清兵南下，郝尚久降清复反清，兵连祸结；被残明永历

朝廷封为“潮王”的郑成功又在潮汕沿海各地坚持抗清斗争前后达十二年之久，后据台湾，支持明朝残局。明代遗老遗少相率逃难海外，又促使海阳人民进一步向东南亚移殖。清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十一日，靖南王耿继茂攻下潮州，郝尚久投井自杀；耿竟“纵兵屠掠，死者约十万。”清康熙元年(1662年)实行迁界海禁政策，限粤、闽沿海人民内迁五十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支持。海阳县属的“龙溪、上莆、南桂三都和东莆、秋溪、江东、水南四都之半”均属迁界之列，被遍迁徙的人民“哀鸿遍地归何日，祇索吞声说旧踪”。潮汕沿海一带成为“田庐荒墟，坟墓无主，寡妇孤儿，哭望大末”的悲惨世界；导致“农工商贾，皆籍船为业”的沿海人民再次被迫出洋谋生，或参加郑成功部队。“时清廷通海之禁，沿海居民迁徙万家，皆陆续潜赴台湾。”或在台湾安家落户，当时在台南县建成之潮州镇，至今犹称；或由台湾乘海外贸易之船转赴东南亚各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平定台湾之后，乃解除海禁，开始准予沿海对外贸易。自此“海疆宁谧，商民两益。”

濒临南海的潮州，由于沧海桑田，海岸南移，明清之时，潮汕平原已冲积而成，人口大增，但潮水仍可抵达庵埠镇。当时的庵埠被称为：“邇海濒，烟火万家，商贾百货之所集”。庵埠与樟林、鸥汀背、柘林、黄冈等地先后为潮州商业贸易的重要口岸。由于商业发达，人口大增，“土田所入，纵大有年亦不足三月粮。”加上封建剥削有增无已，水旱、虫灾频仍，赖土地为生的农民纷纷破产，奸商市侩又屯积居奇，各地不断发生饥民抢米风潮。清王朝为缓和阶级矛盾，据《清实录·圣祖实录》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要求暹罗官运三十万石大米到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贩卖，

给予免税优待。雍正二年（1724年）暹罗米运到广东，清政府令地方政府按时价买卖，不许行户任意压价，压船随带货物也一概免征税银。雍正六年重申：“米谷不必上税，著为例”（《清实录·世宗实录》）。雍正七年，开始准许各省商民和闽省一样到暹罗贩米。当时，樟林、庵埠等地成为暹罗大米的散销地。雍正八年（1730年）曾以海阳县丞分驻庵埠，并于此设立关防（海关）。《清实录·高宗实录》载：乾隆八年（1743年）规定：“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乾隆十一年又规定对载米不足五千石的也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二。乾隆十六年（1751年）决定：对运米二千石以上者给予顶戴。清政府的大米政策，从要求暹罗官运到准许中国商民私贩；从大米免税到随船压船货也减免税；从一般号召到奖励顶戴。这就使一向以航海贸易发达的潮州与暹罗结下了不解之缘。海阳商民纷纷造船、买船往暹罗贩米，破产的农民也随之离乡别井前去谋生。自十八世纪中叶起，海阳人民就源源不断地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出国，直到一八六一年汕头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后才改为汕头。

潮船俗称“红头船”，用白粉油腹，朱砂油头，头部两侧画上黑圈，象鸡眼一样。照迷信说法，船上有眼，才不致迷航失道。但潮船用红色油头，主要是为了容易与福建的“绿头船”相区别，便于海上盘查和税收。离家“过番”的人民，腰缠水布，手提内装一路赖以充饥的甜粿的市篮（竹篮），与家人洒泪而别，到樟林妈祖庙拜神，祈求一路平安后，即登上水黑云深、惊心动魄的海上旅程。流传于潮汕地区的“无可奈何炊甜粿”这句民谣，正是陷入这种境地的破产农民困窘状况的真实反映。泰国民山亭的对联：“渡过黑

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付流水，想做座中无归唐山终老骨头归义山”！更道尽了广大华侨的辛酸。相传当时海阳秋溪都一带的内地农民要出国谋生的，都在今铁铺镇石丘头村溪边的娘祠码头搭船往樟林港，然后转乘“红头船”赴国外。娘祠码头遂成为潮州华侨出国历史的一处遗迹，至今已有二百多年了。乾隆年间，为暹罗国破敌立功的秋溪都鹤塘乡华侨陈式，就是从樟林港赴暹罗的；现官塘石湖村存有他回国后建筑的“卫分府”。按《泰国潮州会馆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特刊》载：此一时期潮人移殖泰国，“有史料可资查考者，为一七八二年至一八六八年，潮州一带乘红头船移人泰国者人数甚众；此一阶段约一百年，华侨人数达一百五十万人。”

早在十五世纪以前，已有潮人到达马六甲等地。十九世纪，潮人在马来亚各地当种植园和锡矿工人的人数很多。《马来亚潮侨通鉴》有如下记述：“据传英人莱佛士未抵星（1819年）以前，新加坡为一渔村，马来苏丹住于石叻门。有海阳人十余名，每受巫人残杀，乃由暹招集潮侨前来，居住于山仔顶，即今粤海清庙宫地；嗣有庵埠东溪（今仙溪）人王欽及王丰顺两人首先航海来星，为潮侨领袖，建粤海庙（新加坡华人古庙，首建于1826年以前），创‘义安郡’”。从樟林港赴新加坡谋生的海阳华侨，有传记可考的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生于故乡庵埠茂龙村的潘存正。存正少颖悟，对经济学术精益求精；继思株守非计，乃纠合同志于樟林港乘“红头甲板”抵新加坡，初于今小坡梧槽尾草创一小染料店，然后才逐步发展，大展宏图。另据传记所载：曾被霹雳王聘为“顾问官”的许武安，清道光五年（1825年）生于檳城；其父许桺合，祖籍彩塘宏安乡人，早在北马从事垦殖，为北马华侨实业家。祖籍庵埠亭下村的陈亚汉，一八五〇

年前后任霹靂甲必丹（管理华侨头领），他的儿子陈成宝侨生于怡保，一八七〇年前后也成为新加坡的潮侨领袖。

宋、元两代，闽粤人到印尼谋生者已甚众，明初郑和下西洋后，到印尼的华侨大量增加。就后来形成的各帮而言，潮州帮居闽帮、客家帮之后，人数居第三位。早期到印尼的潮人大多数从事农业和种菜，大多数居住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也有少数居住在爪哇等地；住在东苏门答腊东岸园植区域的潮人，则多数是烟草园的苦力。

总之，早期海阳华侨向外移殖是因为航海通商贸易的关系，居留在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口岸；先至安南、暹罗后，才至东南亚其他地区。继之，朝代更换，遗臣遗民出国避难或谋生等因素也起了作用。后则因为天灾人祸，华侨移殖海外不断激增，才有深入到侨居国内地去开发和从事各种职业，并落地生根，定居于当地。

二、近、现代潮州移民高潮迭起和原因

近、现代，潮州人民远涉重洋、高潮迭起、不断移殖海外的现象，固然与“潮州地狭民稠”、濒临汕头口岸的地理位置有牵连，也与潮州经济的发展及对外贸易发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与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因素的影响有关连。鸦片战争后的旧中国，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经济凋蔽、城市失业、农村破产；本来“土田所入，纵大有年亦不足三月粮”的潮州，更根本无法容纳从农业和手工业中游离出来的大批劳动力，终于迫使一大批走投无路的劳动人民不得不出洋谋生。从一八五八年增开潮州为通商口岸到民国三年改称海阳县为潮安县，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新